

孙中山派我策动飞行人员反陈炯明的经过

胡 汉 贤*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登上永丰舰，指挥讨逆，并电已攻下赣州的北伐军回师靖难。北伐军与叛军激战于韶关附近帽子峰、马坝一带。因梁鸿楷第一师陈修爵团投入叛军，倒戈相向，北伐军遂失利，退至南雄；本拟再部署进攻，旋接香港来电，获悉孙先生已离开永丰舰赴上海。北伐军乃分两路撤退：一路由李烈钧率领朱培德的滇军、彭程万的赣军和陈嘉祐的湘军，进入湘南；另一路由许崇智率领粤军和李福林的福军和黄大伟督率大本营亲军一团经江西三南、瑞金，转入福建，后协同皖系王永泉部攻占福州，改组成东路讨贼军。

我当时在北伐军飞机队任飞行员，也随许崇智那一路进入福建。飞机队在北伐军回师失利后，在始兴都塘铺机场将全部飞机6架及弹械销毁，免为叛军所用。由飞机队正队长张惠长率部分员工，随李烈钧进入湖南，后张转赴上海见孙先生，另由副队长陈庆云率全部飞行员随许崇智到福建。

行军途中，备尝艰辛。飞行员陆露斯因病死去。周宝衡、余启成等在筠门岭跟不上队伍，为农民收留，后到汕头转香港。我和蔡斯渡等抱病行军。我军抵福州，我即转沪就医。到沪后，先见到胡汉民，后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询及华侨飞行员情况，我据实以告。孙先生见我有病，即叫张惠长送我入虹口医院疗治，住院差不多一个月，身体恢复健康出院。

这时，恰好杨仙逸自美国抵沪，带有在美学成飞行员黄秉衡、林伟成等十余人，其中并有两个飞机制造家，还在外国购有一批制造飞机材料回来，准备自行制造飞机，随后制成轻型轰炸机。

孙中山先生因见上次委任朱卓文为航空局长、张惠长为北伐飞机队长，两人均不称职，又互相倾轧，对队员不能团结，出发时又败坏军风等，决定不再任用；乃在沪另特委杨仙逸为航空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配合东、西路讨贼军，回粤讨伐陈炯明。孙先生并对杨仙逸指示，前留粤第二飞机队队员，因受朱、张排挤，现为陈逆所利用。彼等均是在外国学成飞行归来的，其中有数人属在加拿大强华飞行学校学员，系中华革命党党员，曾参加讨袁华侨敢死队，都属热心党国同志，现虽误入歧途，可设法策动他们反正讨逆；其次，广东尚有飞机十余架，如能令飞行员将机队就地起义，无论对我们回粤军事还是发展航空事业，均有莫大好处。

孙先生委杨仙逸为航空局长后，又亲书“特派胡汉贤为飞机联络专员”手令，叫

* 作者曾为强华飞行学校校长，北伐军飞机队飞行员、飞机联络专员。

杨仙逸带给我，要我回粤策动飞行人员反正讨逆。因我曾任过强华飞行学校校长，与留粤飞行员熟悉。杨同我去见孙先生，请示回粤机宜。孙先生指示说：你此次回粤，专为策动飞机队反正，责任重大，宜秘密行事，杨局长现在未能回粤，你可先到港与卢师谛联系，我已有电着他接济。在杨局长未到港之前，各事可直接向卢同志联系请示。

我奉命后，于1922年10月底（或11月初）离沪到港，先到大东酒家见到卢师谛（卢当时被孙先生委为策反讨陈专员驻港），打听粤省情况后，即返广州。先到东堤荣利新街林安家里，找到强华飞行学校同学，留粤飞行员林安、余百炯等，以同学的情谊和他们谈话，互诉别后情况。发现他们还是拥护孙先生，从逆是迫于不得已。我问及前留粤飞机队长，现为陈逆任命为航空局长的陈应权的情况，他们反映陈应权也是拥护孙先生的（因陈是华侨出身，过去曾受孙先生的培养），但很仇恨朱卓文对他的排挤。我见各人情况如此，即开门见山，说明孙先生派我回粤策反。林安等人表示响应，并提议找陈应权商量。于是我们便到陈应权家。适是日星期天，陈应权在家，见到我非常诧异，问我从何而来。我答经沪回。他又问孙先生情况如何。我据实以答。再问朱卓文和张惠长的情况。我说孙先生极不满意他们两人，以后不加任用，现杨仙逸带领一批在美学成飞行人员到沪，被孙先生任为航空局长，我们发展航空事业，将有一番新气象。林安即将我来意剖白。陈云我航空界同属一家，将来无论何人居首，我都赞成，惟朱卓文我则反对，你既负此责任回来，不妨与我和各华侨队员见面。我说恐怕泄漏消息。陈云，我们是患难同志，担当决不负你。次日陈邀同亲信队员十余人到他家吃便饭。商谈之后，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孙先生，愿为革命效力。我告以各人原有职位不变，于是各人满意告别。我顺路到竺横沙探望由福建北伐军归来的航空局机械工人向日葵，随后我同向日葵回港，向卢师谛报告回穗初步情况，并电杨仙逸转报孙先生。11月间，奉到孙先生密电，说广西滇、桂联军正东下讨伐陈炯明，驻江门、西江一带的粤军中，亦有一部分拟乘联军东下反正响应，四处民军也已运动成熟，就地起义，共同讨逆；要我加紧进行策反飞机队工作，最重要是保存原有各机勿令损失；并说杨仙逸不日到港，最后叫我再回穗主持策反工作。

我接密电后，恐频频来往港穗之间，为陈逆所部获悉，改饬同我来港的向日葵回省，邀同林安、余百炯等来港，商定最后进行步骤。隔天，向日葵与林安、余百炯、胡荣焕等来港，我即同他们往大东酒店见卢师谛。卢说：粤军与海军一部分，已集中江门，由古应芬主持，一俟滇、桂军进入粤境，即在江门联同各处民军起义响应。你们飞机队，最好能起飞向陈逆总司令部轰炸，如不能，需将各机飞往江门。我现在联络海陆军，对于飞机队反正事，你们可与胡汉贤具体联系，但事情切勿泄漏，以免影响全盘作战计划。又说昨接杨仙逸电知，他日间亦到港，你们需要各物，我当尽量接济，并嘱我带林安等回寓，商定一切后，即刻回省，不可逗留。

我同林安返寓后，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反正计划如下：（1）认为起飞轰炸陈逆司令部一事，在联军未进入广州时，机队单独行动，过于冒险，不宜进行；（2）将所有飞机飞往江门，因江门只有水机场，没有陆机场，决定只将水机飞往，陆机将重要机件拆除，假作修理，存放机库，运动可靠的掩护队予以保护，剩下的飞行人员到时躲藏起来；（3）在叛军逃跑时，可看情况起飞侦察，必要时跟踪追击。

反正计划商定后，林安等即回省按计划行事。我则往江门见古应芬，说明来意，要他准备接应水机来江门。我碰见朱卓文、陈策也在江门，他们问我来干什么。我因事属军事秘密，又孙先生已不再任用朱，故对他们伪说是返乡（开平）探亲，顺道经此。接着我转到广州秘密策应，发现飞行员陈炎长近日与陈逆总司令部来往甚密，恐有破坏行为，着陈应权设法加以羁縻。我则在竺横沙向日葵家里躲避。幸陈炎长素有神经质，口不择言。他对陈应权说，陈老总（陈炯明）近日拟委我为飞机队第二队队长，你是否同意？陈应权伪装赞同，并伪为他调编队员。他非常高兴，对陈应权说，我们是兄弟，又与陈老总同县，他决不有负你我。陈炎长又要求陈应权往总部催发委任状。陈应权伪予答应，以安其心。

1922年12月下旬，滇、桂、粤联军克梧州，粤军第一、三师等起义响应。叛军节节败退。1923年1月初，滇、粤联军占领肇庆，广州震动。陈逆总部命令飞机队派机前往侦察，由队长余百炯与陈炎长分驾水机两部飞到西江一带侦察。原拟不携带炸弹，陈炎长坚持要带炸弹。当时逆军总部军官在场，同意陈炎长意见，但吩咐不能乱炸，因怕军队未能识别，恐有误会。陈炎长飞到肇庆，见联军东下，竟投弹一枚而回，非常高兴，向逆军总部报告。逆军总部也因此不怀疑飞机队有变。

这时，讨贼联军已攻占三水，直逼广州，大约是1月13、14日间，我即令林安、余百炯带领水机6部与飞行员10余人，伪托以侦察为名，向西江飞去，转到江门北街水面降落。陈应权为对付陈炎长有异动，未有飞去。叛军纷纷逃命，退住东江，无暇顾及飞机队之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策反计划。是晚桂军沈鸿英的李易标部最先进入广州。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于一两天后始进入广州。

克复广州次日，卢师谛、杨仙逸带同一批由美国新回的飞行员到省，杨即同我和陈应权往大沙头航空局接收。当时部分飞机已拆卸，部分水机则在江门尚未飞回。杨仙逸即派我与陈应权同往江门将6部水机及人员飞回广州。但当我们到达江门北街时，朱卓文用前航空局长名义，将飞机加以接收，并和陈策拟扣留陈应权。我与之交涉，拿出孙先生委我为联络员手令，并说明孙先生已另委杨仙逸为航空局长。大家闹到古应芬处，古偏袒朱卓文，不给我接收，托词须再请示孙先生。我即电知广州杨仙逸转电上海孙先生让古应芬照办，旋即接孙先生电示古应芬说：航空局长已另委杨仙逸继任，所有飞机及人员全交杨接收，朱卓文不得干涉。他们至此才没话说。但陈应权因此惧怕朱卓文等仇视打击，连广州也不回，即逃到香港，脱离了广东航空事业。我和飞行员周宝衡、陈秀、张同发等，将6部水机飞回广州大沙头交给杨仙逸接收。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第二次任大元帅，而命杨仙逸召集反正的飞行人员加以慰留，一律委用。但经此次变故，这些人多有惧怕心理，恐有类似朱卓文的人，以“投逆”罪名加以打击。同时杨仙逸又经美国带回一批亲信飞行人员，人多机少。于是这批曾依附过陈炯明的飞行人员各散西东，其中有强华飞行学校学员一批也离去，各谋出路，如李仲唐往云南，林安往上海，余百炯、余启成住厦门，黄家达返乡（台山）务农，黄荣臻、胡汉臣、马少汉、甄健民、陆求胜等返回美洲谋生。我则继续任航空局飞行员，旋被孙先生委为开平县长，筹措军费支持当时驻开平、恩平一带的梁鸿楷、黄明堂、林树巍等部队和邓本殷部叛军作战。

（1966年）